

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被毁后的办刊策略

——以《东方杂志》复刊为视角

钟 晨 音

(浙江师范大学 学术期刊社,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 从晚清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 商务印书馆一直是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重镇。在商务印书馆的定期刊物中,《东方杂志》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1932 年 1 月 28 日晚, 商务印书馆因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 损失重大,《东方杂志》也被迫停刊。1932 年 8 月 1 日, 随着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正式复业, 停刊 8 个多月后《东方杂志》复刊。复刊后的《东方杂志》以追求“新生”为办刊旨趣, 注重与读者及作者的沟通, 并且通过主编及编辑人员的调整和“教育”、“妇女与家庭”与“文艺”三专栏的增设, 及时整合了刊物办刊资源, 使刊物顺利度过了危机。

[关键词] 商务印书馆; 《东方杂志》; 办刊策略

[中图分类号] G23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2-0110-03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夏瑞芳、鲍贤恩、鲍贤昌等人集资四千元, 在上海江西路创办了一家民营商业性印刷出版机构, 后来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1]。从晚清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 商务印书馆一直是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重镇。青年时代在“商务”工作过的著名作家茅盾, 曾填词称赞这家出版社在近代维新大业中, “曾开风气, 影印善本, 移译西哲”, “数出版先驱, 堪推巨擘”。何炳松在总结商务印书馆 36 年来的贡献时, 认为其“贡献之荦荦大者计有四端”: “即教育教材之供给, 中外名著之印行, 实际教育文化事业之举办, 国货之提倡。”^[2] 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物的印行上, 除了《四部丛刊》、《汉译世界名著》等中外名著的系统印行,《辞源》、《教育大辞典》等工具辞书的出版外, 还创办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等定期刊物。

一 商务印书馆的定期刊物及其影响

商务印书馆自编的定期刊物, 不但文化品位较高, 而且涉及诸多领域。当时有影响力的定期刊物包括《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儿童世界》及《儿童画报》、《小说月报》、《自然界》等。这些杂志不但内容丰富, 而且材料新颖^[3]。加上商务印书馆办的杂志, 不只是一般地介绍、传播近代学术思想,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杂志, 来引导国内的思想文化新思潮^[4]。而在这些定期刊物中, 尤以《东方杂志》最具影响力。

《东方杂志》创刊于 1904 年(清光绪三十年)3 月, 其创刊号登载的《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中的第一条就明确指

出了其办刊宗旨: “本杂志以启导国民, 联络东亚为宗旨。”在办刊形式上则“略仿日本太阳报, 英美两国而利费 Review of Review 体裁, 除本社撰译论说, 广释新闻外, 并选录各种官民日报、旬报、七日报、双日报、每日报、名论要件以便检阅。”根据这些撰译、选录的文稿,《东方杂志》设立了“社说、谕旨、军事、外交、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小说、丛谈、新书介绍”等专栏。可以说,《东方杂志》在办刊初期的“稿件来源多半是从中外各种报刊中选录、摘译”, 因此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实际上是一份具有‘选报’、‘文摘’性质的刊物”^[5]。不过由于其内容极为庞杂, “杂志”之名倒是名副其实。而且由于“分门别类搜罗宏富, 选择精审”, 所以“有志之士, 欲检查时事者, 得此可免抄录之繁”, “内地人士无力遍阅各报者, 得此亦足周知中外近事”, 加上《东方杂志》全册用洁白洋纸装订, 而且杂志“字数较现行各杂志为多, 售价极廉”^[6], 所以该刊从一创刊起, 就畅销海内外。

1920 年 1 月 10 日, 钱智修以坚瓠为笔名, 在《东方杂志》第 17 卷第 1 号上发表了《本志之希望》一文, 指出“杂志界之职务”, “以言论为最重大”。“吾国之一线希望, 唯在与社会自觉”, “故今后之言论, 亦将以促社会之自觉者居大部分”^[7]。这篇《本志之希望》, 可以说是《东方杂志》办刊宗旨的一大转变。为贯彻这一宗旨, 在钱智修等人的主持下, 刊物内容和栏目进行了新的调整, 新栏目如“评论”、“世界新潮”、“科学杂俎”、“读者论坛”、“时论介绍”等开始出现; 在内容上“关于现实问题的文字居先, 关于学术思想的文字居后。”^[8]这种发展和演变, 一方面显示了《东方杂志》为“顺应世界之潮流”在办刊宗旨及策略上的调整, 另一方面也体现

[收稿日期] 2011-03-21

[作者简介] 钟晨音(1974-), 男, 浙江舟山人, 浙江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副教授。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了《东方杂志》主办者在办刊过程中对杂志定位及出版事业价值的新理解。正如钱智修 1923 年在《本志的第二十年》中所说的:“本志虽涵多方面的内容,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预备做一个上下古今无所不包的杂拌。……我们所占着的时间,既然是被科学精神和民治主义两大潮流所支配的二十世纪,则我们估定一切言论和知识的价值,当然以对于这两大潮流的向背为标准”,“杂志的最大职务,是纪录现代的思想;是为欲追求世界智识而无暇阅读专书的人做一种简明的报告。”^[9]

正是因为《东方杂志》这样的一种办刊理念,所以当上海在 1925 年 5 月 30 日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时,由于当局的压力,当时上海的各大报刊都不敢对此次惨案进行揭露,《东方杂志》却挺身而出,在 1925 年 7 月出版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这期增刊由于注重事实调查,并且收集了大量的法律证据及反映事实的照片,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谎言,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东方杂志》在“五卅”事件中的作为,体现了其“欲对于现代的任何问题下一个公平确当的批判,其有待于智识之基础与事实之观察者”^[9]的办刊理念,也体现了其为实现办刊理念的勇气,这种理想的坚守也使得《东方杂志》赢得了知识界及社会的尊重。可以说,在“一·二八”事变之前的《东方杂志》,以“讨论时政”、“增进国民知识”为宗旨,已经成为了中国当时杂志界之重镇,国内许多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政界要人,都在该刊发表文章。不但“有裨学术”,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读者皆以万计”^[2]。

二 商务印书馆被毁后的办刊危机

1932 年 1 月 28 日晚 11 时,日军发动入侵上海的“一·二八”事变,日本陆战队突然侵犯闸北,我十九路军奋起自卫。1 月 29 日凌晨,日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闸北华界,以后接连数天,日军轰炸机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投掷炸弹,房屋全部被毁,损失重大。何炳松先生在《商务印书馆被毁记略》中曾对被毁后的势态及损失情况作了说明^[2]。在侵华日军制造的这一惨烈的文化劫难中,商务印书馆遭受重创。

(一) 大量设备被毁

商务印书馆当时各种设备十分完善,应有尽有,“在远东尤无其匹”,“其重要者有滚筒机、胶版机、米利机、铝板机、大号自动装订机、自动切书机、世界大号照相机等,总数达一千二百余架之多”。但在 1932 年 1 月 29 日十时许,日机接连向商务印书馆投下 6 枚炸弹,第一枚就弹中印刷部。由于商务印书馆厂屋及设备全部被毁,一时不能全部恢复。所以当《东方杂志》复刊时,“在印刷技术方面,不免发生许多困难。制图排字,一部分工作,只好暂时委托别家工厂代办。”^[10]

(二) 办刊资料被毁殆尽

东方图书馆当时为亚洲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 30 万册。在这场浩劫中也被大火“焚毁一空”,“三十年来继续搜罗所得之巨量中外图书,极大部分之旧四部各善本,积累多年之全部中外杂志报章,全套各省府厅州县志,以及编

译所所藏各项参考书籍及文稿,至是尽化为劫灰。”^[2]在这次事变中,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存稿大部分被毁。由于东方图书馆被炸毁,“一切编辑方面参考的材料书籍,都得重新设法罗致。单就《东方画报》这方面说,本社历年积存的国内外时事照片千余张,尽付一炬。”《东方杂志》旧编辑部由于是在东方图书馆楼下,所以也损失惨重,日军撤退后,“只剩下了钢筋水泥的屋梁和墙壁,依然屹立着。烧残的纸灰,经过雨淋化成了泥泞,积得有三四尺高。此外就找不到什么了”,《东方杂志》在排印中和正待付排的文稿,除事先匆促移出一部分外,都化成灰。”^[10]

(三) 专业人员的流失

由于商务总管理处、总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被日军炮火焚烧,损失巨大,所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停业,解雇全体职工。这虽然是当时的无奈之举,但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商务馆多年来培养和积累的印刷、编辑等专业人才的流失。商务印书馆停业期间,《东方杂志》主编钱智修到政府任职。商务馆复业后,虽有不少老员工回来继续工作,但由于经历浩劫,“不得不暂时采取紧缩政策,削减工作人员,同时我们的旧同事,也有一部分,因为个人生活的变动,离开了我们”^[10]。

三 《东方杂志》的复刊及其办刊策略

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在 1932 年 8 月 1 日正式复业,《东方杂志》在停刊 8 个多月后,于 1932 年 10 月 16 日刊出第 29 卷第 4 号,在这期《东方杂志》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复刊号”,复刊号的出版意味着灾后《东方杂志》的新生,同时也体现了商务印书馆人在遭受日军野蛮轰炸后,在定期刊物上恢复出版的努力和策略。

(一) 以“求新生”为办刊宗旨

在《东方杂志》复刊号上,新任主编胡愈之撰写了《本刊的新生》一文,这是其作为主编的身份第一次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字。其内容表明了新生《东方杂志》的办刊宗旨:“从兵灾后的灰烬瓦砾中竭力挣扎,重新振作,创造本刊的新生,创造民族的新生,这是本志复刊的一点小小的——也许是过分夸大的——愿望。”虽然不能单靠文字救国,但“现代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阵,都用着非常复杂的方式,没有文字和理论来作指导,断没有决胜的把握”,所以应“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我们不敢相信一定可以达到我们的标的,但是能做到几分,我们就做几分。”^[11]这一办刊旨趣的确定,使《东方杂志》带上了“救国求新生”的色彩,符合了当时国民的时代诉求,更容易得到读者的认可和共鸣。

(二) 以《东方杂志》中的专栏代替专刊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定期杂志中,《教育杂志》、《妇女杂志》与《小说月报》都有了多年的历史,在出版界也有相当地位。但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几种大杂志,“除了《东方杂志》以外,一时都不能复刊,所以《东方杂志》除维持原状外,并须暂时作为商务印书馆别种刊物的代用品。”^[10] 1932 年 29 卷 4 号的《东方杂志》复刊号在栏目和序例上面目一

新,除设立“东方论坛”外,还添设了“教育”,“妇女与家庭”与“文艺”三专栏。“教育栏”是继承以前的《教育杂志》,“妇女与家庭栏”代替以前的《妇女杂志》,而“文艺栏”则为《小说月报》的后身。因为篇幅有限,所以“教育栏”和“妇女与家庭”两个栏目,每隔一期轮流刊登。“文艺栏”则附在每期《东方杂志》内。以专栏代专刊,可以说是商务印书馆在办刊极其困难的情形下,对办刊资源的有效整合和调整,其目的是“希望能够竭力保存这三种旧刊物的个性及其特长”^[10]。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办刊策略是成功的。1934年7月6日,《东方杂志》第31卷14号的“读者作者与编者”栏有这样的内容:“现在教育杂志就要复刊了,本年九月十日发行复刊号,教育栏所侵占的‘东方’的篇幅,到九月十日也就收回了。”试想,如果没有《东方杂志》在复刊时通过“教育栏”的设置,延续《教育杂志》的影响力,《教育杂志》的复刊会面临更多的问题。

(三)主编及编辑队伍的调整

《东方杂志》虽然复刊了,但主编钱智修先生却因在商务馆停业其间到政府部门任职而离开了《东方杂志》。钱先生自1910年就加入《东方杂志》编辑部,而且从1920年第16卷起担任《东方杂志》主编,在《东方杂志》先后工作时长达22年。在其担任主编期间,《东方杂志》“顺应时代潮流”,成为当时“关注现实问题”、“纪录现代思想”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综合性杂志。钱先生不能继续担任主编,商务馆便任命胡愈之为《东方杂志》的新主编。胡愈之1914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15年8月起,任《东方杂志》助理编辑、编辑。升任胡愈之为主编,据王云五《关于〈东方杂志〉的回忆》中的说法是:“我因爱才之故,于东方复刊时,钱君既无法返任,乃依序擢胡氏为主编。”^[12]这说明胡愈之不但有才,在《东方杂志》编辑部具备相当深的资历,熟悉《东方杂志》的相关业务是其担任主编的重要理由。这里也应有商务馆希望在重要的转折关头,新的杂志主编能给刊物带来新生气的期待。由于新增设了“教育”、“妇女与家庭”与“文艺”三专栏,所以在编辑队伍上,聘请前《妇女杂志》编辑金仲华先生担任“妇女栏”主编,前《小说月报》编辑徐调孚先生担任“文艺栏”主编,“教育栏”主编则为安徽大学哲学教育系教授赵廷为先生。至于原先三种刊物的前编辑人周予同,郑振铎先生等人,虽不担任名义,但经过《东方杂志》的努力,“都愿意和我们合作”,“仍允许常期为各专栏撰稿。”^[10]

(四)加强与作者和读者的沟通

《东方杂志》停刊长达8个月,重新复刊后,《东方杂志》非常注意和读者的沟通。在1932年的复刊号上,发表了王云五的《卷头语》何炳松的《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编者作者与读者》,以及“东方论坛”栏目上愈之的《本刊的新生》等文章。对《东方杂志》复刊后的新旨趣、商务印书馆被毁的情形,以及《东方杂志》复刊后为何要采用专栏代替专刊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这些文章,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在遭受日军轰炸后面临的危机,以及商务印书馆在艰难的情形下,希望通过《东方杂志》的复刊分析

指导现实和复兴民族社会的努力。在当时国难当头的现实环境中,这种表白使社会大众更能理解《东方杂志》办刊方针及栏目的调整。

为了获得作者的支持,《东方杂志》恳请国内外的著作家“和以前一样地帮助指导我们,和以前一样地常期供给我们一些文稿……尤其希望在国外留学界,常期给我们一些通信。”复刊后的《东方杂志》还通过征询读者意见的形式,表达了对读者的尊重。如复刊后新开设的“东方论坛”一栏,其本意是在栏目增多,版面有限的情形下,“发表我们一些零碎的小意见,但这边只是一种尝试。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纷扰的年头里,我们不会有‘意见’,有了也不一定让我们随便发表。现在暂且试一下,看读者对于这一栏有什么反响。”“对于国内外十余万的爱读者们,我们诚恳地盼望给我们一些批评和意见,尤其是复刊以后本志内容及形式的批评。这些批评是我们所热切期望而不易得到的。以后读者的通信,我们将择要在‘编者作者与读者’栏内发表。”^[10]这种沟通和努力,当然是《东方杂志》希望在复刊过程中得到作者读者等各方面的参与和帮助,但同时也很好反映了处于非常时期的《东方杂志》放低自己的身份,努力和刊物作者及读者沟通的办刊策略。

三 结语

《东方杂志》从1932年底复刊至1938年初撤离上海之前,它的发行量居同类刊物之首,最高达6万份左右,发行范围遍及沦陷区外的国内主要城市,以及美洲和东南亚的近20个城市,堪称综合性学术期刊中的佼佼者。复刊后的《东方杂志》能获得如此的成功,应该与其面临危机时采用的有效策略有一定的关系。遭受重创的商务印书馆在危机中的办刊策略体现了当时的传媒人面对困境的勇气,其在危机中果断启用新主编、整合办刊资源、主动加强和作者及读者沟通的做法,对今日的办刊人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树年,柳和城.张元济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7.
- [2] 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J].东方杂志,1932,299(4):3-10.
- [3] 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736.
- [4] 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52.
- [5]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764.
- [6] 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J].东方杂志,1904,1(1):1-2.
- [7] 坚瓠.本志之希望[J].东方杂志,1920,17(1):1-3.
- [8] 坚瓠.编辑室杂话[J].东方杂志,1921,18(3):8.
- [9] 坚瓠.本志的第二十年[J].东方杂志,1923,20(1):1-4.

(下转第115页)

次是标准和整合问题,目前国内外使用 RFID 技术的图书馆所采用的系统设备标准不尽相同,而不同的标准对 RFID 系统的互通和整合带来不便。另一方面,近些年来,国内部分大中型图书馆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陆续实现了藏、借、阅一体化的图书管理模式,出于对投资的保护,现有的设备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取代,投入巨资购买 RFID 智能化管理系统不是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

(二)解决办法

作为物联网的重要技术,RFID 经过标准的制定、产业的发展、应用的引导、市场的开拓,当大规模的 RFID 开始应用成为现实,其最后的结果就是物联网的发展。因此,RFID 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将决定我国物联网的发展速度,当前应该加快 RFID 自主标准的制定、核心技术产品的研发、产业链的创建和应用的快速推进。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已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特征。发达国家往往通

过控制国际标准的制定来抢占发展的制高点,在 RFID 市场同样如此,我国应该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兼容相结合的战略,加快制定我国的 RFID 标准^[4]。另一方面,在加快 RFID 技术自主标准制定的前提下,推进核心技术产品的研发和产业链的创建有利于快速占领市场,降低成本。

[参考文献]

- [1] 甘琳. RFID 技术在图书馆的创新应用 [J]. 图书馆论坛, 2008(6): 11-12
- [2] 蔡孟欣. RFID 在图书馆应用的可行性研究 [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6(4): 18-19
- [3] 远望谷. 远望谷 RFID 产品在图书馆行业的应用 [EB/OL]. <http://www.invengo.cn> 2008
- [4] 张琪. 从 RFID 到互联网 [N]. 中国信息产业网—人民邮电报, 2009-08-04

RFID Technology' s Application in Library Intellectualization Managem ent

OU YANG Cai-xi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RFID technoby will bring the new transformation in intellectualized managements to the library.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concept, the characters and the application background of RFID technology, elaborated its application goal in the intellectualized managem ent, introduced its concrete utilization procedure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finally pointed out the problems existed and the concrete solution in the application.

Key words RFID; Library; Intellectualized managem ent

(上接第 112 页)

- [10] 编者作者与读者 [J]. 东方杂志, 1932, 29(4): 89-93
- [11] 愈之. 本刊的新生 [J]. 东方杂志, 1932, 29(4): 11
- [12] 黄良吉. 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之研究 [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8 13

Publication Strategies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fter its Destruction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 perspective of the resumption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riental Magazine

ZHONG Chen-yi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1930s, The Commercial Press had been an importan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s cultural publishing. Among its regular publications, the Oriental Magazine has a broad impact on society. The Commercial Press was bombed by the Japanese planes on the evening of January 28, 1932, which caused huge losses, and The Oriental Magazine thus was forced to cease publication. On August 1, 1932, as the headquarter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Shanghai resumed business, The Oriental Magazine resumed publication after being suspended for more than 8 months. The Oriental Magazine then pursued "re-birth" as its aim for running the business, focusing o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aders and authors, and by means of restructuring editor and editorial staff, and opening three additional columns: "Education", "Women and Family", and "Literature and Art", it timely integrated resources of publication, which helped the magazine to survive the crisis.

Key words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Oriental Magazine; publication strategies